

赵萝蕤的藏书

刘铮

文书：一是巴尔扎克的小说《贝姨》(La Cousine Bette)，一是瓦莱里(Paul Valéry)的文论集《杂俎五集》(Variété V)，书前空白页上都写着“萝蕤一九四七”。1947年8月1日，陈梦家自美访欧，9月4日搭机返芝加哥。9月19日，陈梦家从旧金山搭船回国。可想而知，1947年下半年，赵萝蕤有很多时间是一个人待在芝加哥的，或许也有更多空闲访书读书了。关于瓦莱里，可以说几句。赵萝蕤曾回忆：“我于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，当年秋季考上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，成为一名研究生。我在燕京大学念过三年法语。到了清华当然还要继续读法语。于是选了温德老师教授的四年级法语。记得该课的内容是高乃伊、拉辛与莫里哀的戏剧，德·缪塞、拉马丁等的诗歌。温德老师法国文学的知识很丰富。后来我还念过他的波德莱尔、司汤达、梵乐希等课……”(《我记忆中的温德老师》)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《中译(尤利西斯)读后》中，赵萝蕤也曾写道：“60年前我还是清华大学外文所研究生的时候，听了艾略特、乔伊斯、吴尔芙夫人、梵乐希等人的名字，产生了好奇心一读他们主要作品的念头。”梵乐希，是瓦莱里的早期译名。赵萝蕤在清华时既接触过瓦莱里的作品，在美国见到有瓦莱里的新著出售(这一版《杂俎五集》是1945年11月29日印的，故还称得上“新”)，当然会想到买来一读。但愿望是一回事，事实却是另一回事。现在我们有把握说，赵萝蕤并没有读这本瓦莱里的作品，甚至也没怎么读巴尔扎克的《贝姨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事实上，两册法文书均为毛边本，按当时法国的装订习惯，书页上端及右侧大半折而未裁。假如一位读者想按部就班地阅读，从第二页起就必须将连在一起的书页裁开，才能继续往下读。而《杂俎五集》的正文从第二页起即未裁，《贝姨》也只裁到第33页。1948年12月，赵萝蕤取得博士学位后乘船返国，她的跨洋行李里便装着上面谈到的三本书。

四十年后的盛夏，我回到故乡，想去贵池看看。有了这个念头，就发动了车子，还是从大河口出发，沿347国道，经安庆，过长江大桥，上沪渝高速，到池州下高速，从齐山大道进城，开往那所改成市博物馆的学校旧址，全程一百公里，用时一百分钟。学校已经撤并，贵池也恢复了唐代的旧名——池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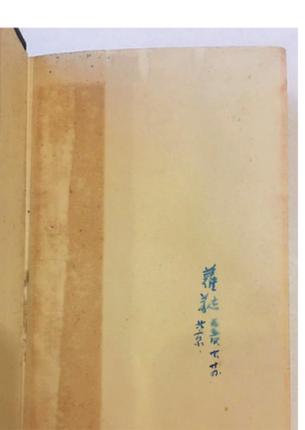
从地图上找到城市的中轴线，很快恢复了方位感。连接城中烟柳园和城北港口的南北干道仍然叫长江路，西起杏花村、东到清溪河的秋浦路与长江路纵横交错。两条主干线交错的地方原是城市中心，现在依然热闹。楼房改变了城市空间，主干线却能删繁就简。视线落在眼前具体的楼房上，马上就不知身在何处；透过一幢幢楼房，重新拟构过去的道路框架，四十年前的场景又逐一浮现在脑海，邮局、新华书店、百货大楼、人民理发店，我能看到它们的影子，与眼前光鲜的楼群叠印在一起；就像有月光的晚上，湖面倒映着树影，树影、真实的树丛都在月光下模糊起来，看不出谁更虚幻。

我看到自己在这些楼群中穿行。

赵萝蕤1949年起在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，1952年“院系调整”，燕大西语系并入北大，10月15日，赵萝蕤搬到北京大学中关公寓303号，而陈梦家调入中国科学院古所工作。“由于陈梦家不能天天回北京西郊的家，夫妻之间常通信”(子仪《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》，第342页)。两人分居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陈梦家用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下一座四合院。

1954年10月24日，星期日，赵萝蕤买到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“世界文库”版的精装本小说《克兰福镇》(Cranford)，她在书前的空白页上写了“萝蕤一九五四、十、廿四北京”。星期日为休息日，赵萝蕤或许是在书店里购得的。该书系正规引进，书后空白页贴着统一的价格签，售价旧币22500元，相当于现在的2.25元，在当时是颇为昂贵的。在价签旁有铅笔写的一行小字“五四、十一、二完一遍”。这说明赵萝蕤在十天之内读完了这本四百页的英文小说，速度不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夏鼐日记》载，11月2日赵萝蕤读完小说的那天，夏鼐“中午与陈梦家同志偕往天坛大剧场，观苏联音乐剧院所排演的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”。夫妻尽管同城，却分处两地，于是，只能一个读《克兰福镇》，另一个观《天鹅湖》，但无论如何，精神生活还是充实的罢。赵萝蕤为什么会在此时购读这样一部书？恐怕是因为1949年后文艺氛围丕变，《克兰福镇》的作者盖斯凯尔夫人却因为马克思《英国资产阶级》一文中，与狄更斯、萨克雷、夏洛特·勃朗特一道被誉为“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”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豁免权，其作品得以在中国知识分子间流传。赵萝蕤读《克兰福镇》的次年，盖斯凯尔夫人描写劳工生活的长篇小说《玛丽·巴顿》就译为中文出版了。晚年的赵萝蕤还在文章中大力推崇勃朗特姐妹、狄更斯的作品(《多读点文学作品》，《英语世界》1983年第1期)，想来她阅读《克兰福镇》的体验该是愉快的。

书买来之后，有的认真读了，有的一点没碰，这恐怕是阅读的常态，是在每位读者那里都没什么两样的。借着赵萝蕤旧藏的这四种书，我们知道她同样如此，也是好的。



赵萝蕤旧藏《克兰福镇》封面和她在《克兰福镇》书前的签名

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

冯渊

1982年9月17日清晨五点，我在泥塘河流进幸福河的大河口等船。我要到遥远的贵池县城去读书。那一年，我14岁，第一次出远门。父亲送我，我们先坐帆船到皖河农场，再由皖河农场坐小轮船到安庆。

在安庆沿江码头，我看到五六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在江面上缓缓航行，上面写着“东方红”三个字。父亲说，这是从武汉开往上海的下水轮。从安庆到贵池，是这艘轮船往下江开的一段短暂旅程。我如果坐上大轮，就能遇到武汉来的人，也能遇到去上海的人。跟他们一起航行，我就能感受到遥远的异乡气息。可惜的是大轮晚上才有班次，我们急着赶路，选择了长途汽车。

傍晚五点在学生宿舍里安顿下来。这一天，我经历了过去从未经历的事。我坐了帆船、小火轮、长途汽车、长江轮渡，穿过了泥塘河、幸福河、长江、秋浦河。往学校走的路途上，秋雨迷茫，一些梧桐叶纠缠在我的脚边。

四十年后的盛夏，我回到故乡，想去贵池看看。有了这个念头，就发动了车子，还是从大河口出发，沿347国道，经安庆，过长江大桥，上沪渝高速，到池州下高速，从齐山大道进城，开往那所改成市博物馆的学校旧址，全程一百公里，用时一百分钟。学校已经撤并，贵池也恢复了唐代的旧名——池州。

从地图上找到城市的中轴线，很快恢复了方位感。连接城中烟柳园和城北港口的南北干道仍然叫长江路，西起杏花村、东到清溪河的秋浦路与长江路纵横交错。两条主干线交错的地方原是城市中心，现在依然热闹。楼房改变了城市空间，主干线却能删繁就简。视线落在眼前具体的楼房上，马上就不知身在何处；透过一幢幢楼房，重新拟构过去的道路框架，四十年前的场景又逐一浮现在脑海，邮局、新华书店、百货大楼、人民理发店，我能看到它们的影子，与眼前光鲜的楼群叠印在一起；就像有月光的晚上，湖面倒映着树影，树影、真实的树丛都在月光下模糊起来，看不出谁更虚幻。

我看到自己在这些楼群中穿行。

春雨绵绵，一个周末。我撑着雨伞，从长江南路拐进廊家巷、平安巷、陆家巷。没有任何目的，就是想看看。我穿过一家家店铺和人家，只想看到不一样的生活。一个老头用篾刀做晾衣架，他干瘦的胳膊上包裹着薄薄的皮肤，像一只鹤。一个年轻人穿着喇叭叭，放着录音机，在房子里跳舞。巷子里铺的是青石板，在雨里发亮，房子的外墙都被春雨洗得干干净净，有的爬上了常青藤。室内的烟火气使得房子内部幽暗、杂沓。有关人类的生活，我只能看到一丁点，我要在小巷子里找谁呢？

那时我正在读德国作家施托姆的小说，我疑心施托姆是世上最好的作家，他的《茵梦湖》《燕子归来时》《木偶戏子保罗》我最喜欢。施托姆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十多岁的少年男女，他写出了知慕少艾时期的所有梦幻。我还喜欢他追述往事的笔调，譬如故事的开始是多年以后，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，一个庄严的老者坐在马车上，缓缓行进在古老庄园古木参天路上。我常常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历尽风霜的老者，一肚子心事，情感浑厚深刻，两眼仍然清澈，在暖暖的秋阳里，与古堡融为一体。我盯着小说集插图上他微蹙的双眉——他经历了多少故事。而我，只是一张白纸，薄薄的、透明的纸。

在这些小巷子里我什么也不会找到，这里没有施托姆。但我仍然对奔走本身感兴趣，直到鞋袜、裤腿全被春雨打湿，脚心因不停走动而滚烫。我想找到一个人，跟他分享心深处的秘密。从课业那里，我得不到快乐。同学在研读《武林》杂志，在操场上练气功，要短棍。

我看到自己在旷野里穿行。从烟柳园往东南方向走，很快到了城外，一条很长的公路，两边都是田野，绝少人家。路尽头就是齐山。周末我常常一个人走在路上。小时候看过反映谍报工作者的电影，潜伏者革命成功之后，走在山水之间，扬眉吐气，步态雍容，花草含笑向他示意。我觉得自己也正迈着这样的步伐。无边的庄稼地在眼前铺展，有诗句无端涌到嘴边，细雨

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为什么要念这种与凯旋者毫无关系的句子？我不知道。

奔走使我疲劳，疲劳使我平静，平静让我呼吸到了一些悠远的气息。一天，从齐山回来，在田野深处，我看到一户人家门前，一个女孩坐在矮凳上，拿高椅当桌子，铺开作业本，端端正正写着作业。夕阳照着她的发辫，她的衣服，她的手，她的钢笔和练习本。她身后是一片黄土地，豆荚已经鼓胀。风从平天湖吹来，吹过豆叶，吹过芝麻花，她的发丝在风中微微飘起来，她认真书写，恍然不知。

我迅速走过去，不敢打搅她。但我多么希望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，跟她一起写作业，或者，念一句宋词，或者，讲到开心处，说说施托姆？

我连她的长相也没看清。我只看到夕阳下她的影子长长地覆盖在黄土地里，像云朵的影子留在波光潋滟的湖心。

很多年后，师生宴聚，觥筹交错间，熊老师反复感叹，那时你是一个忧郁的小男孩，现在你变得这么明亮开朗。

我只是看上去明朗了。那时的内心才是真正的澄澈。现在的明朗是我自己塑造出来的形象。隔着四十年的光阴，我看到那个男孩捧读施托姆小说的光景，真想轻轻抚摸一下他的头发，握住他的手。一点温柔的接触，就能让他回到现世的温暖里。他执著地在孤独的世界里徘徊，永远遇不到懂施托姆的人。

四十度高温的天气里，我将车停在平天湖畔，开足空调。透过玻璃窗，静静观看湖上波纹。

我在平天湖畔待了整整四年，学业负担不重，在我最喜欢读书的年华，读了很多我喜欢的书，当然远不止施托姆。重新回到湖畔，我在想熊老师的那个感叹。无论多么温情地回想，我也只是这座城市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过客，但就我自己而言，确实是这里的空气给了我滋养，使我成为后来的样子。

高温天气，也有风吹过，湖水仍然掀起阵阵浪花，拍打在岸边。

我读过的作品里，有塞纳河、多瑙河、莱茵河、日内瓦湖，那些水边发生的故事，心灵的纠结与苦痛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，但我没有机会去见那些河流湖泊，就连长江，我也是14岁才第一次见。人一生中能见到的东西总是有限的，但人的阅读会远远超过他真实见到的东西。与真实的见相比，我更喜欢想象和回忆中的见。

背诵《岳阳楼记》时，我就坐在故乡小镇的焦赛湖畔：有月亮的晚上，辽阔的湖上升腾起雾气；朝霞漫天时，我一抬头就看到湖上的片片碎金。我觉得范仲淹见到的就是我眼里的湖水，多年后登上岳阳楼俯瞰洞庭湖，反倒没有什么强烈的感受。

我坐在齐山脚下平天湖畔，静静读书，克里斯朵夫成长的焦灼、克里斯蒂娜的忧伤、爱玛的幼稚与浪漫、卢梭的赤诚坦率……整个周六的下午，我背靠高大的毛竹，面对浩渺的湖水，有时沉醉其间，有时废书而叹。以至于后来好多年我都做同一个梦，梦见走很长的路，穿越沟沟坎坎，到人迹罕至的湖边，在清晨的万道阳光下朗声读书。

等到月亮升起，我又回到平天湖。晚上的湖畔更见风致。穿过齐山的九座山峰，听到蛩蛩热闹的歌鸣，还有刚醒的知了，突然唱了半句歌就戛然而止。更多的虫子发出了暧昧不清的合唱，成为夜晚声音的主体。车灯照亮了碎石小路，两旁灌木的枝条柔软地覆盖到路中央，它们也在想与对方握手。

到得湖边，再回望刚才走过的山，山峰上的树群在月光的映照下，像一张张剪纸，最边缘的地方，总是毛茸茸的，有细微的凸起。

湖面有风吹来，是黑色的热风。我从平天湖边学会认识世界，理解人类隐秘的心灵，激情，绝望，痛苦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，那些特别光鲜的东西，就像硕大鲜艳的花朵盛开在枝头，不需要探究，必定会遭遇，你得练就挑剔的眼光。而人类真实的生活其实在梦里，在不经意的言辞里，在无神的眼睛突然生动起来的某个时候，在维持看到绿带的那一瞬。人类的许多光阴就像这湖面，平缓，宽大，拖泥带水，只有隐藏在湖水深处的波涛、漩涡，才是湖的本质。

我在湖畔走来走去，挺起胸膛，步伐稳健，目光坚定，嘴角露出微笑。我真的笑出了声响，低头看手表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一点点。

这些书和这座城没有关系，哪里都能读到。但我是平天湖畔读的，我只记得最初阅读的情境和感受，克里斯朵夫与他舅舅的对话，我以为就发生在平天湖畔的齐山上。

“舅舅，怎么办呢？我有志愿，我奋斗！可是过了一年，仍旧跟以前一样。……我没有出息，没有出息！我把自己的生命蹉跎了……”

他们正在爬上一个俯瞰全城的山岗。高脱弗烈特非常慈悲地说：“孩子，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呢。人是不能要怎么样就怎么的。……继续抱住志愿，继续活下去。其余的就由我们作主了。”

……冰冻的雪在脚下格格地响。冬天尖利的寒风，在山岗上把赤裸的枯枝吹得发抖。他的脸也被吹得通红，皮肤热辣辣的，血流得很快。……他眼中还含着泪。他用手背抹掉了，望着沉在水雾中间的旭日，笑了出来。……“吹罢，吹罢！随你把我怎么办罢！把我带走罢！……我知道我要到哪儿去。”

我是人海里的一滴水。此刻，我盯着湖水看，火烈的阳光下，湖水一波一波，漾到低平的岸边。四十年，我奔波了很多地方，遇到了太多“不由我们作主”的事。我还在奔跑。我像当年走在那些城中的小巷子一样，以为广袤的湖水里有许多隐秘，我想接触这些隐秘的地方，遇到可喜的人和事。十二万平方公里的湖水里，藏有多少秘密？

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看周遭的一切。鲜艳的荷花，披拂的垂柳，掩映在绿树中的拱桥，这些都能把握和抚摸的东西我不感兴趣；我只捉摸湖底看不见的东西，那里藏着什么？

这么多楼房，这么多行人，你认识谁？这么多灌木乔木竹子杂草，你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吗？

看上去似乎能把握的东西，其实也未必能把握，为什么还要对看不见的湖底充满欲望？

对，是欲望，就是想要将自己全部融进深深的湖水里，让身体像湖水一样庞大无边，让皮肤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。

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我一下又找到了当年在湖畔奔走的少年。他还是那么寂寞。刻骨的孤独。他的眼光总是看着不存在的远方，对着不可知的未来，说着谵妄之语。

我回到城市中央，在最热闹的店堂里，与穿梭的人群一起晚餐，虽然我一个人都不认识。

等到月亮升起，我又回到平天湖。晚上的湖畔更见风致。穿过齐山的九座山峰，听到蛩蛩热闹的歌鸣，还有刚醒的知了，突然唱了半句歌就戛然而止。更多的虫子发出了暧昧不清的合唱，成为夜晚声音的主体。车灯照亮了碎石小路，两旁灌木的枝条柔软地覆盖到路中央，它们也在想与对方握手。

到得湖边，再回望刚才走过的山，山峰上的树群在月光的映照下，像一张张剪纸，最边缘的地方，总是毛茸茸的，有细微的凸起。

湖面有风吹来，是黑色的热风。我从平天湖边学会认识世界，理解人类隐秘的心灵，激情，绝望，痛苦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，那些特别光鲜的东西，就像硕大鲜艳的花朵盛开在枝头，不需要探究，必定会遭遇，你得练就挑剔的眼光。而人类真实的生活其实在梦里，在不经意的言辞里，在无神的眼睛突然生动起来的某个时候，在维持看到绿带的那一瞬。人类的许多光阴就像这湖面，平缓，宽大，拖泥带水，只有隐藏在湖水深处的波涛、漩涡，才是湖的本质。

我在湖畔走来走去，挺起胸膛，步伐稳健，目光坚定，嘴角露出微笑。我真的笑出了声响，低头看手表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一点点。

又记曾国藩论学之语曰：“学问之道，必当心有所得；著书之法，必当未经人言。近世儒者，掇拾陈文，无别条理，是抄胥耳，不如饱食高卧之为愈矣。”

笔会

学问之道，求博守约

——金陵生小言

蒋寅

萨显灵，设石案供饌不绝。迄1996年遂复建之，再现伟观。人或论其规模过奢，予阅《赵烈文日记》，载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七道经仪征，谓“傍城东郭行，有废观名泰山宫甚大，岂宋仪真观之址耶？”知原建筑实甚可观。

阅吴玉纶《香亭文稿》：“壬午夏迁于琉璃厂南夹道，王渔洋之旧寓，藤为渔洋手植。”钱大昕《潜研堂集》有《题吴香亭湖庐古藤诗思图》：“海王之村近书市，新城尚书曾卜庐。藤花一本手所植，岁久翦败惟枯株。”又云：“比邻更续舍人。”自注：“谓程鱼门。”案：渔洋自言琉璃厂寓所，在火神庙西夹道，《宸垣识略》《藤阴杂记》并同。吴氏云南夹道，疑为传

闻之误。予昔尝往访之，渺不知火神庙所在，以为中国书店即其地也。今火神庙栋宇既复，西侧夹道巷口标示渔洋故居，行至巷底一院，民居杂沓，无复旧观，吴氏所言渔洋手植之藤益无可觅。

赵烈文《日记》，读王夫之《思问录》而感慨：“吾儒为学不可博，不博则陋；而所守不可约，不约则荒。王氏之学精微博大者已炳炳矣，又取工技小术以核论之，凡事务求其异。如言岐黄而以大黄、芩连为火剂，以堪舆而以山脉为无来去，皆其荒也。尧舜之智而不遍物，吾愿学者知所取舍而已。”时之今日，学问益富，研求益精，学人尤当佩服此言，求博守约。

南宋宁隲，字才公，官迪功郎，雅好宾客，杨万里称其“一日无客，意象闷闷。客至，必取车辖投之井，壶觞淋漓，豆筵旁午，卜夜继晷，尽欢竭赏，靡有小靳”。又朝散郎虞璠，杨万里称“客至，必取其车辖投井中，掇从者出之门外，禁毋得歌《骊驹》，于是卧尊壘，飞盏罍，投壶弈棋，赓酬诗句，大笑为乐，不极欢不止”，此皆汉唐一流人物也，乃竟藉杨万里撰其妻墓志而略传其事迹，亦可谓不幸之幸矣。

陈用光子小石，娶吴嵩梁女为妻，以父列名姚闾四大弟子之首，妇翁吴嵩梁诗名满天下，故有文愧为子、诗愧为人婿之语。

仪征东岳庙创始于南宋嘉定初，明永乐间重修扩建，且受诰封。中为前殿、大殿、二殿，侧有火神殿、都天殿、城隍殿、十王殿，后有官楼、望江楼及客堂、斋堂、寮房等，多至九十九间，甲于江淮间。民国间犹存六十五间云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为酒厂所占，予就学日记其侧，见东墙偏殿犹存。某日雷雨后天墙隐显人形，俗传为苦



「文汇报」微信公众号